

中德關係發展的歷史研究： 1861-1917

虞和芳*

摘要

本研究是 Dolphin Foundation 科研和文化基金會與台灣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多年合作計畫中的中德關係歷史研究之一部份。此計畫所發表的前兩部探討：其一為德國在 17 世紀早期的文化交流，主題為 1861 年普魯士王國與中國帝國所訂立的條約，開始中德文化外交關係。其二為研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 1919 年到 1939/1941 年間的中德關係。本文探討的歷史時段從 1861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在 1917 年向德意志帝國宣戰。本研究的重點在於中國 1870 年至 1895 年的自強運動，德中廣泛密切的合作。德國在山東半島 1897 年到 1914 年佔據膠州灣/青島為殖民地，和在義和拳運動時，德國大使 Clemens von Ketteler 於 1900 年 6 月 20 日在北京被謀殺。因此引起由德國的元帥 Alfred von Waldersee 為首的八國聯軍進攻。

關鍵字：經貿關係、軍事武備合作、自強運動、帝國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

*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



壹、導論

本文研究的時段是從 1861 年到 1917 年的中德關係，即從 1861 年 9 月 2 日中德訂立的《中德通商條約》所建立的外交關係起，到 1917 年 8 月 14 日中國對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宣戰為止。

這半世紀對德國來說，德國由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s）做主導，在 1871 年德法之戰，德國戰勝後法國完成德國境內的統一，成為德意志帝國的時期。德國由此升級，成為工業和商業的領導國家。在世紀轉換之時，逐漸成為外交獨立的德意志帝國，其發展的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

俾斯麥為普魯士宰相，到德國統一，決定了北德聯盟的政治方向，直到他於 1890 年退出宰相之職為止。德國統一後，俾斯麥在歐洲採取和平政策，確保他完成統一帝國的安全。他的外交政策，跟俄國訂立友好關係的條約，孤立法國的外交政策，和英國保持友好關係，逐漸放棄跟當時其他歐洲列強競爭帝國主義的政策。因此在東亞和中國的關係上，德國在列強國家中，是唯一不以帝國主義來威脅的國家。

俾斯麥的政策不符合發生了變化的時代精神。在德國有聲望的政治精英和中產階級要從事世界政治。從這個角度來看的政策，像所有其他大國，涉及全世界海軍基地和殖民地領土的政策，並有助提升德國所追求的國際聲譽。其結果是在 1897 年德國海軍佔領中國山東半島的膠州灣，並與中國在 1898 年 3 月 6 日訂下不平等的租賃條約，成為德國殖民地，首都為青島。中德關係為此受到影響，在時間的過程中，關係又有改善。其它帝國主義列強擴大其影響力的殖民領域



在中國遠遠超出德國。俄國在滿洲，英國在揚子江，法國在中國南部。而日本帶來新的威脅，中日之間的戰爭在 1894 年至 1895 年接踵發生。

這個新世界的政策是擴充德國海軍艦隊武備，其結果與英國的關係惡化。俾斯麥離開後，德國不再延長與俄國的再保障安全條約（Rueckversicherungsvertrag）。德國外交政策也不想繼續單方面受到合同約束，而是行「政治自由之手」。德國為新興的、成功的工業國家，被其它商業強國，視為強大的競爭對手，尤其是英國。德國的貿易，很快超過當時領先的工業強國英國，僅次於美國。進一步的發展，法國與俄國之間的和睦聯盟，英國也逐漸加入，形成漸漸針對同盟國的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威脅。法國，俄國和英國的協約國，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聯盟系統，德國感受到受到圍堵，外交因而陷入孤立。

德國 1900 年以後在中國的東亞政策，是接近美國的政策，即是反對列強殖民地瓜分中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其立場為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並積極建立友誼，特別是透過文化政策，從在上海設立的同濟大學，到現在為止中德合作的中心，促進德國和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

中國在 1917 年站在協約國這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德國宣戰，此乃北京軍閥政府段祺瑞受到英國和日本的壓力的決定，反對孫中山的意願。因而德國喪失自 1861 年以來在中國的所有投資。

第一次世界戰爭結束之後，中國和德國之間又有新的接觸。1921 年 5 月 20 日德國與中國簽定的條約，是西方國家與中國，站在平等的基礎上的第一個條約。其他大國與中國不平等條約延續在 1911 年以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下面進一步介紹 1860 到 1917 年的中德關係。

貳、中德關係發展的歷史研究：1861 至 1917 年

中國和德國關係的歷史發展由來已久，這裡探討 1861 年德國和中國正式奠立外交關係至 1917 年的歷史。研究範圍包括外交、政治、經濟關係、文化交流和軍事安全。

以下對這時段重要事件的發展和轉折點，進行重新整理和分析。包括的期間為德國和中國之間外交關係：1861 年到 1917 年的世界戰爭的斷交，研究的重點，在於透過不同階段，對歷史事件的結構做分析探討。

一、中德關係的歷史概述

觀察中德關係的歷史，在 17 世紀，中德間為文化關係，從 18 世紀起，中德之間為直接貿易關係，而 19、20 世紀可以劃分三個主要時期：

- (一) 1861 年至 1917 年期間：中國和德國在 1861 年 9 月 2 日訂下第一個條約，開始外交關係，到 1917 年 03 月 14 日斷交。
- (二) 1921 年至 1941/1945 年：從 1921 年 5 月 20 日的協議，恢復關係，到 1941 年 7 月 2 日的斷交。
- (三) 1949 年到目前的時期：從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中國 1949 年 10 月 25 日至 1990 年的關係—1957 年 9 月 27 日德國經濟東方委員會貿易協定的中德之間的貿易關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DR）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始於 1972 年 10 月 10 日—以及非官方的德國與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關係。

在這些主要的時期中，要區分不同的階段，其中有若干轉折點，或說彼此間的關係有了明顯變化的特徵。本文主要探討第一階段，時期為 1861 年至 1917 年。

(一)、過去的歷史

德國和中國之間的文化和經貿關係，遠在外交關係之前。在 17、18 世紀的明朝和清朝，許多德國耶穌會士，包括著名學者鄧玉函 (Johannes Schreck, 1576-1639)¹，對中國和歐洲之間的文化交流具有很大的貢獻。受到中國的委任，改革日曆。湯若望²為北京天文台的天文研究所主任。當時歐洲對中國評價非常高。這是基於耶穌會士的報導。德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起源於 18 世紀 1731 年掛普魯士國旗的阿波羅號 (Apollon)，首次滿載中國貨物，從廣州抵達漢堡港。自 1847 年以來普魯士在廣州為貿易而設領事館，它並不具有政府間外交任務關係。

除了海港廣州交易，時而有俄國的過境貿易，這是基於

¹ 鄧玉函 (Johannes Schreck) 是修習神學和醫學，為一名醫生，他進行解剖研究，當時在歐洲是禁止解剖死者。他精通好幾種語言，除了德文和中文，他說得一口流利的義大利語、葡萄牙語、法語，閱讀和書寫拉丁和希臘文，他研究數學和天文學。他是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的一個學生和朋友。當伽利略在歐洲受到迫害，宣佈放棄他的教誨學說，鄧玉函能在中國提出尼古拉哥白尼 (Mikołaj Kopernik, 1473-1543) 日心說的世界觀。但鄧玉函超出意料的於 1630 年在北京死亡，顯然是對自己身體做醫療實驗的結果。請參閱 Hartmut Walravens, *China illustrata: Das europäische Chinaverständnis im Spiegel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Weinheim: Wiley-VCH, 1987), pp. 23-35; Bernard H. Willeke, "Terrenz," in L. Carrington Goodrich,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vol.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282-1284.

² 為了紀念這段時期，德國和台灣於 1992 年發行紀念湯若望 400 年誕辰的郵票。



1727 年中俄「恰克圖 (Kjachta) 貿易條約」的基礎上。1822 年俄國開始抽取過境稅，使得中德交易在這種方式下，無利可圖。因此普魯士政府在 1859 年派出四個船舶探險隊到東亞，其任務是與中國簽訂貿易協定，並與中國，日本和暹羅（泰國）建立外交關係。

(二)、德國在中國進行的外交關係

德國在中國開始的外交關係是始於 1861 年 9 月 10 日友誼商業和運輸合同。當時中國正受到內憂外患的侵擾。此合同簽訂時，正逢中國的生存危機之際。外部受到所謂的 1856 年至 1860 年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內部受到太平天國毀滅性的內亂。要了解中德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必須從整體的中國外交關係歷史背景，和內部的發展來觀察³。

這之前的歷史，這裡只簡單的敘述。中國的外貿在 18 世紀時為不相稱的蓬勃發展。因為中國出口相當數量的茶葉、絲綢和其他商品。國外進口貨物，大多數以銀幣來交易。特別是英國對此貿易的逆差，深感不利。此外貿調控只在廣州，中國對此外貿的限制和多項規定，時常引起衝突。從英方的角度來看這兩種限制都違反自由貿易的原則。1793 年英國使臣 Lord George Macartney 勳爵會見乾隆皇帝，對貿易上的諸多問題，得不到解決。19 世紀初以來，英國開始從英屬印度，主要從孟加拉對中國輸入鴉片。中國政府嚴格禁止鴉片進口，鴉片貿易在走私下進行。而鴉片證明是有利的商業交易，能扭轉銀幣倒回英國的一大途徑。銀幣因此大規模的從中國開始流入英國。貨幣供應量短缺，引起通貨緊縮的效果和加重稅務虧損的危機。此外鴉片消費增加，造成公共健

³ Jürgen Osterhammel, *China und die Weltgesellschaft* (Muenchen: C.H. Beck Verlag, 1989), pp. 139-147.



康的損害，馬克思（Karl Marx）對這種情況下，稱此為“自由貿易以販毒”⁴來解釋。

中國政府終於在 1838 年決定採取積極的措施來制止此事。道光皇帝派遣林則徐為兩廣總督，授以特權，處理禁菸。林則徐第一步逮捕走私販，鴉片商人和腐敗的官員。到 1839 年年中，約有 1600 人被抓，73,000 鴉片和 70,000 鴉片煙槍被沒收。國外經銷商拒絕交出他們的鴉片存貨，林則徐軟禁 350 名外國人，迫使他們繳出 20,000 箱鴉片，他示範性的毀滅這些鴉片。他以道德為出發，來向英人申訴，沒有得到回覆，他又轉向維多利亞女王說明此事。

英國貿易在廣州和澳門的監督 Charles Elliot⁵，宣布沒收的鴉片是屬於英國王室，此燒毀的鴉片，成為戰爭的藉口。在 1839 年至 1842 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過程中，看出中國傳統的滿清軍隊不足以對付西方模式的現代武裝，和訓練有素的英國部隊。

中國戰敗，訂立《南京條約》，不但五口通商，在 1838 年和 1873 年間，運到中國船隻的鴉片數量從 40,000 每年增加到 96,000 箱，此外中國的賠償 2,100 萬銀元並割讓香港給英國。當時在 1843 年的補充條約內，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受到限制，這是限制主權，外國人在中國犯罪，不再遞交中國

⁴ Karl Marx, “Die Geschichte des Opiumhandels,” *New-York Daily Tribune*, September 20, 1858, Nr. 5433.

⁵ Charles Elliot 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中文為查理義律爵士（1801-1875），為英國軍官和殖民地官員，1836 年至 1841 年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後因鴉片貿易問題，導致英國對清廷宣戰，為第一次鴉片戰爭，並率先在 1841 年 1 月 26 日派兵佔領香港。請參閱 George Beer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sanna Hoe and Derek Roebuck, *The Taking of Hong Kong: Charles and Clara Elliot in China Water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法院，而必須歸於所屬國家的領事裁判。⁶

英國輸入鴉片，變本加厲，白銀大批外流，白銀大批外流還加上賠款，加上民生健康受到鴉片的毒害，中國的經濟大受影響。中國的金產量不多，不如外國。在中國境內，本國人的交易多是以銅來為互換的幣值。因為中國的銀子外流，銀子數量減少，銅幣換成銀子的兌換率就不平衡，可是繳稅要以銀子來繳交，無形中等於稅率加高，導致中國的經濟更顯蕭條。

這樣中國內部經濟衰微，人民不滿，太平天國之亂，使中國的國勢更衰弱。1851 年至 1864 年的太平天國之亂，在中國種種複雜的情況下產生，2,000 萬中國人民喪生，造成毀滅性的破害導致長期中國經濟的損害。民生更無力衰弱，更無力對抗外來的侵略。英國趁中國內部的混亂，跟法國聯盟，在 1856 年以侮辱中國走私 ARROW 船上的英國國旗，又發動一次的戰爭，進一步敲詐中國的權利和付款。

1858 年 6 月 27 日的《天津條約》⁷中國開放其他的 10 個港口和開放內部，特別是長江流域。鴉片進口在中國合法化，在全國能自由的傳教（鴉片和傳教士在同一個合同中出现）。中國又再次賠償 600 萬兩白銀。英國和法國，以及俄國和美國也加入部分這個合同，享受獲得權利，在北京建立常駐使館。由於咸豐皇帝拒絕批准這個條約，英法又再次開戰。外國軍隊攻擊北京，中國蒙受巨大的損失⁸。法國和英國

⁶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⁷ 《天津條約》包括《中美天津條約》、《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中俄天津條約》。

⁸ 僧格林沁，出生 1811 年，逝世 1865 年，僧格林沁為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圖哈薩爾第二十六代孫，1857 年以欽差大臣督天津防務。他英勇善



軍隊摧毀和佔領中國的首都北京。頤和園遭受到洗劫。皇帝逃到北部熱河宮殿。他的弟弟恭親王留在北京與外國列強談判。

在 1860 年 10 月 18 日的《北京條約》⁹中，確證天津條約，中國必須作出更多的讓步。¹⁰1859 年的普魯士由 Grafen Friedrich zu Eulenburg 伯爵領導下的四艘艦，其任務為跟中國、日本、暹羅（泰國）第一次訂立外交關係。要跟中國雙方的合同談判遇到不少困難，除了有過貿易的衝突外，兩國的世界秩序觀念不同，中國認為其為世界秩序中心，而東亞國家之間存在著等級關係。

這與西方模型理論上平等的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同。以中國為中心的基礎上，是基於儒家倫理的相互義務的等級秩序。1884 年至 1885 年，中國和法國的戰爭¹¹，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滲透應該停止，而 1895 年中日戰爭，為反對日本在韓國擴張性政策，這是以中國為中心義務援助的相互關係。這個世界體系的中心是以中國皇帝為天子，對天下一切都負責任。對於中國周邊國家，如韓國或安南（越南）。中國皇帝有合法化的功能，與歐洲較早期的羅馬教皇類似。外交關係是維護使節貢獻，每隔幾年，這些國家的使節去北

戰，1859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指揮大沽口海戰，大敗英法聯軍，並同李朝儀於寧河、營城、大沽等地修築炮台，抵禦侵略。1860 年大沽口、天津失陷，他統率以蒙古騎兵為主力的軍隊，退至通州防守，其部與英法聯軍戰於通州之八里橋慘敗，蒙古主力盡喪。英法聯軍入燕京，毀圓明園。旋被奪爵，仍任欽差大臣。1860 年九月，後奉旨「剿捻」被殺於麥田。請參閱周學軍，〈僧格林沁及其子孫出生日期考〉，《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4 期，2008 年 7 月。

⁹ 《北京條約》包括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中俄北京條約。

¹⁰ John Y. Wong,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¹¹ 邵循正，《中法戰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



京，以禮儀方式進貢禮物，並接受皇帝的禮物。

歐洲國家不願接受對中國，國與國之間的等級制度關係。中國不願接受歐洲列強的制度，不以中國為中心的等級制度，而是以平等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普魯士意圖在北京建立長期性的使館，被認為是野蠻人，闖入滲透到中國文明的中心，是顯而易見的跟中國熟悉的世界秩序不合。¹²西方列強侵入中國的方式，正符合中國所認為外國人是野蠻人的偏見。在主權國家之間的平等關係和自由貿易的口號下，使用武力，將中國東亞的世界秩序系統破壞毀滅。

隨著中國市場開放的自由貿易，其結果為中國喪失國家主權和領土。在這不平等關係下，中國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環伺中的半殖民地。這使中國人越來越感覺到國家的恥辱。要想方設法「讓中國強」，追求獨立和贏回國家名譽，這是中國好幾代人的目標，塑造今日中國人的思維和心態。自此恢復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成為中國外交政策關注的中心，創造達成此條件，為國內政策的主要目標。中國難以實現這一目標，是由於中國內部動亂，分裂和長期的內戰，由此產生的衰弱。帝國主義列強總是一再地利用這弱點，做進一步的侵犯。去除 19 世紀所訂下的不平等條約，額外的權利，在 1911 年革命，和第一次世界戰爭，為中國一再的努力，可是仍然被列強拒絕此發展，顯著提高了民族主義和後來加重政治極端化，對中國歷史的過程演變具有很大的影響。外國列強在中國最終殘留治外法權，直到 194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才得以取消。

¹² 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二、奧倫堡考察團和1861年條約

1859年底，奧倫堡考察團(Die Eulenburg-Expedition)¹³由 Danzig出發的普魯士艦隊經過八個多月時間，在1860年8月上旬抵達新加坡。在船上，除了船舶水手和外交官，還有科學家和畫家最重要的同行者為 Maximilian von Brandt (Max Brandt, 1835-1920)¹⁴，而地質學家和地理學家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¹⁵ (1833-1905) 也隨行，在當時這樣一個漫長的旅程也是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奧倫堡考察團的使命是能為普魯士在中國能取得跟英國、法國、俄國和美國，相等的權利。這樣的條約是有其必要性。尤其在俄國過境貿易由於高的過境稅，使交易變得無利可圖。Eulenburg要為普魯士簽訂等同於其他四個列強在1858年6月27日天津的條約相等的權利，同時能在北京設立使館之權。德國不願在中國的通商受到冷

¹³ 旗艦 SMS Arcona，由 SMS THETIS 和 SMS Frauenlob 以及運輸船 ERBE 伴隨。該探險隊由 Friedrich Graf von Eulenburg (1815-1881) 當領導，他為外交官和後來的普魯士內政部長。代表團的使命是與中國、日本、暹羅(泰國)建立外交和貿易航行的關係。這為具有政治意義的使命，因為普魯士在德國統一前代表德國關稅同盟，它由德國各州組成，包括 Hansestaedte，所以幾乎代表所有的德國州，而 Oestereich 除外。他們要履行一項重要的外交政策使命，這是對內政治與奧地利哈布斯堡 (Habsburg-Oesterreich) 王朝的霸權競爭。在 1858 年有奧國 oestereichliche 護衛艦 NOVARA 在上海進行國事訪問。

¹⁴ Max von Brandt 在東亞居留 39 年，先為普魯士的總領事，之後為北京所有外國大使的總代表發言人。Maximilian von Brandt, *33 Jahre in Ost-Asien: 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Diplomaten, Band 1* (Leipzig: Georg Wigand, 1901); Gustav Spiess,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während der Jahre 1860-1862: Reise-Skizzen aus Japan, China, Siam und der indischen Inselwelt* (Berlin: O. Spamer, 1864), pp. 143-223; Maximilian von Brandt, *China und seine Handelsbeziehungen zum Ausland,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Berlin: Siemenroth & Troschel, 1899), p. 35.

¹⁵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在 1868 年至 1872 年橫跨中國，完成重要的研究調查工作。這項研究的結果，他發表 5 冊書籍，「絲路」由他定下的名。在中國西部的甘肅走廊南緣山脈，曾有一部份的英文名稱是依他的名字命名的，如 Richthofen Range，也就是今日的祁連山脈。



落不平等的待遇，因此非常重視合約的平等要求。¹⁶

Eulenburg打算先與中國進行條約談判，然後到日本，最後前往暹羅（泰國）。但是中國的皇帝拒絕批准天津條約，戰事再度燃起，於是Eulenburg轉向日本。在日本海岸，普魯士艦隊遇到颱風。1860年9月5日，SMS *frauenlob*¹⁷的帆船在橫濱前沉沒，全艘人員淹死。在日本的合同談判遇到困難，在1861年1月24日普魯士與日本締結一項《友誼商務和航海條約》，它可視為德日關係的起源。

普魯士艦隊於1861年3月7日抵達上海，而在1860年10月18日《北京條約》後。在上海第一次接觸到中國的當局。Eulenburg與江蘇巡撫薛煥¹⁸（1815-1880），他為負責上海江蘇地區的外部關係，告訴Eulenburg訂合同，完全是多餘的和不受歡迎：「為什麼總是訂合約？合同總是導致戰爭！」商談毫無結果，在上海是一無進展。¹⁹

因此 Max Brandt 被遣往天津，提前探聽那邊的情況。經過漫長艱苦的談判，Max Brandt 使出各種技巧，通過管事官

¹⁶ Bernd Eberstein, *Preußen und China: Eine Geschichte schwieriger Beziehunge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GmbH, 2007), pp. 171-175.

¹⁷ 此船以 *Frauenlob* (婦女讚) 命名的，因為它由德國婦女樂捐，在 1848 年建立。為了紀念這船，1902 年德國海軍將一艘巡洋艦也以此命名。

¹⁸ 薛煥（1815-1880），四川宜賓人，舉人出身。咸豐七年（1857 年）升道員，次年升江蘇按察使。咸豐十年（1860 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薛煥接任江蘇巡撫，同治三年，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同治五年離職回籍，光緒六年病死於宜賓。請參閱明清檔案人名權威資料查詢，〈薛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cgi/ttsquery?0:0:mctauac:TM%3D%C1%A7%B7%D8>〉，檢索日期：2014 年 7 月 18 日。

¹⁹ 薛煥的任務是拒絕不歡迎的外國人，要他們返回本國。他給上級的一份報告中寫道：向這些野蠻人解釋得我口乾舌燥，但可能無法阻止對方赴天津。請參閱 Graf Philipp zu Eulenburg-Hertefeld, *Ost-Asien 1860-1862 in Briefen des Grafen Fritz zu Eulenburg* (Berlin: E. S. Mittler, 1900).



員，告知北京恭親王，普魯士代表團的來臨。恭親王同時為新創建的總理衙門對外關係總裁，下令與此外國人談判，但採取盡可能的不讓步。當時，中國有兩個權力精英對立互爭。其中一組是不妥協，排外，反對任何使中國文明改變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他們拒絕無尊嚴模仿跟野蠻人西化。另一組恭親王，努力通過必要的現代化改革，認為中國富強，才能抵擋外國入侵，恢復主權。第一步驟是達到內部和外部必要的和平，以便爭取時間和資源做取勝的改革。這是後來所謂的不平等合同，是出於這一目的。他與外國列強談判，與此同時，也得跟反對勢力妥協的人斡旋。

談判是困難的，因為普魯士在中國幾乎是未知的國家，也沒有甚麼威望。中方得知，證實普魯士跟中國所尊敬的鄰國俄國沙皇有姻親的關係，普魯士也為俄國周邊國家（波蘭國家當時不存在）。普魯士跟英國的王室也有血緣關係，這樣普魯士的聲望高升。然而，談判還是異常艱難。經過一段時間後，訂下貿易協定，但是普魯士不能在北京建立公使館。最終得到妥協，雙方尊重。普魯士在北京可以代表所有德國，設立使館（奧地利除外）同時中國有權在柏林建立使館，這項權利只允許普魯士五年屆滿後行使。Eulenburg 達到普魯士和德國各州在中國都能取到跟英國、法國、俄國和美國同等的權利。²⁰包括領事裁判權的不平等條約，它具有限制中國主權的主權，而受到批評。

1861 年 9 月 2 日在天津，德國和中國簽署第一個條約，《中德通商條約》。²¹條約簽訂後，1861 年 9 月 27 日恭親王

²⁰ AA (Auswaertiges Am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Politisches Archiv, Vertrag zwischen China und Preussen 1861.

²¹ 《中德通商條約》，除了普魯士王國，也對德國各邦聯有效，普魯士和 28 個德國海關和貿易協會國。此外三個城，那時也是算獨立邦聯，漢堡（Hamburg）、不來梅（Bremen）和呂貝克（Luebeck），雖然它們不是關稅同盟的成員，以及兩個大公國，Grossherzogtuemer



在總理衙門的款待 Eulenburg 和部分代表團員。1863 年 1 月 14 日在上海成立的普魯士總領事館交換批准文書。第一任總領事為 Guido von Rehfuss (1818-1894)，他在 1862 年 8 月 18 日抵達上海，代表德方交換文書。他在 1865 年為第一位普魯士在北京特使，因此，歷史上，他是第一位德國駐中國大使。²²

(一)、初期的外交關係(1865-1875)

1865 年，第一位普魯士大使 Guido von Rehfuss 要遞交他的證書給總理衙門的恭親王。普魯士特使，代表 1861 年大多數德國各州所訂的合約，因此他是德國第一位駐中國的大使。那時在 1867 年他的頭銜是 Gesandter des Norddeutschen Bundes 北德意志聯邦的大使，德國在 1871 年統一後，他任職直到 1875 年，他的頭銜為德意志帝國大使。²³

他出任此職並不是一番風順。1864 年在合同約定的時間前一年，他想要在軍事上令人注目，在北京上任。Rehfuss 在德國和丹麥之戰時，搭乘 SMS Gazelle 戰艦從德國返回中國。在天津港大沽口之前，普魯士看到三艘丹麥商船錨泊在那，將它作為戰利品擄獲。²⁴丹麥人投訴中國政府。總理衙門在 1864 年以來，並非是無所事事，對國際關係天真無知的時期已成過去。他們獲得國際法知識，特別將美國法學和外交家 Henry Wheaton (1785-1848)，所作的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翻譯成中文。

Mecklenburg-Schwerin 和 Mecklenburg-Strelitz。

²² GstaPK (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I. HA Rep. 120, Handelsministerium, C XIII, 18, Nr.9, Vol. 3-8: Expedition nach Ostasiatischen Gewässern 1860-1890.

²³ 從 Guido von Rehfuss 在中國為大使的期間，看出德國的變化，由北德意志聯邦，在 1871 年德國統一，成為德意志帝國。

²⁴ 同註 16，頁 207-209。



這裡看出，中國政府對跟外國所訂的一些不平等條約，持反對立場和能利用它來維護中國利益。在合同中有一條，外國人互相爭奪權力的糾紛，不准發生在中國領土內。由於德國違反本細則的合同，總理衙門要求德國退還沒收的丹麥戰利品船舶。**Rehfuess** 認為，船不是在中國境內，而是在開放的海洋內而沒收。這時中國提出領海的觀念，丹麥顯然在中國 10 公厘內的領海區船舶。**Rehfuess** 提出，普魯士海軍已沒收的船隻，是根據戰爭戒嚴法，這個問題不是他的領域。恭親王遣人告訴他，如此重要的問題，如果 **Rehfuess** 沒有授權談判，他何必來當普魯士在中國的大使。加上他得要按照條約規定的時間，次年再來商談。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接收 **Rehfuess** 的認證證書。²⁵結果普魯士歸還丹麥船舶，要向中國聲明道歉，並且支付中國 1500 銀元的罰金。

這樣錯誤的出場，**Rehfuess** 只得根據合同內規定的時間，在 1865 年在北京任職。**Rehfuess** 在德國的上司為普魯士總理兼外交部長俾斯麥。俾斯麥的政治目標是統一德國和建立德意志帝國。「不是每個使者是一個靈巧的外交官」(*Nicht jeder Gesandte ist ein geschickter*)²⁶這一詞來源於俾斯麥。這是一個不容易翻譯的雙關文字。俾斯麥本人以前為普魯士在俄國和法國的大使，他也是一個非常靈巧的大使。而 **Rehfuess** 本身並非如此，這可以從這裡和後面的發展看出。

俾斯麥在那些年裡，一次又一次的收到德國吞併和在東亞設立殖民地的建議。有一項正針對台灣。**Eulenburg-Expedition** 的同伴建議，如農業專家 **Herrmann Maron**，地理學家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另一位在 1866

²⁵ 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大陸：中華書局，2008），頁 2626-2627。

²⁶ 在德文 *Gesandte*，為使者，*geschickter* 有兩層意思，一為使者，另一為靈巧，這是一語雙關。



年至 1869 年間，在台灣的漢堡商人 Jakob Milisch (James Milisch)，他也擔任漢堡領事，他的公司 James Milisch & Co。主要進口鴉片到台灣，出口樟木。他跟台灣原住民酋長訂立合同，那時原住民居住在大部分的台灣島嶼。這些合同是允許他剝削島上寶貴的樟木，條件是他提供武器給當地人作為回報，中國當局憤慨不允。衝突越來越大，Milisch 解釋說，他與台灣原住民酋長的條約，在國際民族法上有效，因為台灣不屬於中國。為了進一步達成願望，他要求普魯士軍艦的協助和兼併台灣島嶼，漢堡參議院支持下他。經過北京總理衙門嚴謹的干預²⁷，這次普魯士特使 Rehfuess 的理智處置，Milisch 的計策失敗破產，他在上海消失的無影無踪。

另一個 Eulenburg-Expedition 的同伴 Max Brandt，那時正代表北德邦聯，在日本當總領事，在 1867 年他幾乎在同一時間提出相反意見。他認為台灣多方面不適宜作為德國的殖民地，尤其此舉，有礙跟敏感的中國貿易關係。在台灣的收益不能跟中國通商關係相比。Brandt 提出取而代之，可以得取日本的北海道島。²⁸

但俾斯麥對所有這種類型的各項建議計劃，至少對東亞而言，都加以拒絕。相反的，他認為帝國主義的當代潮流精神，不論德國在國外以及在德國，不是他的政策。他的目標是要確保德國在歐洲的統一，德國的強盛，已引起鄰國的擔心。他宣布，德國放棄進一步擴展領土，和放棄衝突屢起帝國主義的世界政治。俾斯麥並不認為，這對蓬勃發展工業的德國為必要。在他任職期間，德國在中國沒有帝國主義的權

²⁷ 同註 25。

²⁸ Wolfgang Petter, *Die überseeische Stützpunktpolitik der preußisch-deutschen Kriegsmarine 1859-1883* (Diss., 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Freiburg, Germany, 1975), pp. 183-184.



力形象，歷經德國 1870 年至 1871 統一後，1895 德國成為自強運動期間最主要的貿易夥伴之一。

(二)、Burlingame 蒲安臣會見 Bismarck 1869 年至 1870 年

在 1860 年代的末期，中國內部日益穩定，內部、外部暫時恢復和平，是重建之時。李鴻章、曾國藩和張之洞等推動自強運動改革和現代化方案。擬在 1868 年與其他國家修訂條約。總理衙門擔心會損害中國的利益。因此，決定主動倡議外交，正式的跟締結條約國家的首都設立中國大使館。

美國駐華北京公使蒲安臣(Ason Burlingame, 1820-1870)反對帝國主義政策，為恭親王的好友。他是一名律師，也與美國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有深交。1861 年 6 月 14 日林肯總統就職後不久，任命蒲安臣為美國駐華北京公使。因此雖然他不是中國公民，中方指認他為擔任中國首任全權使節，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代表中國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諸國，進行中國首次近代外交活動。

這個外交團由 30 人組成，蒲安臣的兩名高級官員總理衙門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²⁹，以及翻譯張德彝³⁰。蒲安臣的左協理是英國使館翻譯 John M. Brown，右協理是海關稅務司法籍職員 E. de Champs。蒲安臣要達到遠超出了細節的修改條約問題。蒲安臣想要在剛顯現出眉睫的，逐漸在

²⁹ 軍機處錄副奏摺：奏為代奏章京志剛孫家谷奉旨出使各國謝恩事再臣等於十一月初一日奏請預諭日衙門章京志剛孫家谷出使西洋各國一事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何員前往有約各國整理中外交涉事務一等因欽此前授章京志剛孫家谷呈孫負恩命出使重任出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錄副奏摺。

³⁰ 張德彝(1847-1918)一生八次出國，共度過二十七年。每次出國，皆寫下詳細日記，依次成輯《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第七部今已不存)，約二百萬字。



往中國殖民地化的情況內，採取對抗政策，並要中國在國際大家庭佔有其應有的地位。1864年12月12日他寫給美國外交部長 William H. Seward 的信中提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度，人口占的三分之一，第一次試著與西方接觸，當他請求最年輕的國家和其代表，為調解人，陪伴這個旅途使命，不應長久請求或甚至拒絕。」

為了相應西方國家的象徵和習慣，蒲安臣設計一個中國國旗，朝廷批准。一條龍，以太陽的黃色為背景。每拜訪到達一個首都，履行他的使命時，蒲安臣懸掛這面旗幟在他的居住地。在柏林他住在 Hotel de Rome unter den Linden (Ecke Charlottenstrasse)。酒店羅馬下的酸橙樹(夏洛特)街的角落。蒲安臣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有人稱，在他當時的情況，不是很現實。但是只管現實，不能改變世界，充其量只能保持。往理想方向去做是有價值，即使短期未能達成目標或沒有完全達到目標，但給予一個方向，能使事物朝著它發展。代表團 1868年2月從上海出發，經過舊金山 (San Francisco) 和紐約到華盛頓。在他美國的祖國，蒲安臣為中國訂立非常合理的合同，那是天津附加合約，獲得成果。

1869年11月20日大使團抵達柏林，停留兩個月多，至1870年1月31日方離開。德國對他們很友善，八次普魯士王室成員接見他們。威廉一世也接見他們。大部分德國媒體對中國友好，意見看法也與蒲安臣相近。負責政治談判的是俾斯麥。美國國務卿 Hamilton Fisch 轉告俾斯麥，他期望北德意志邦聯與中國的合作，能與美國所訂的相當。俾斯麥信賴的僱員 Rudolf von Delbrueck 已從在北京的使者 Rehfuss 處取得書面意見，看出 Rehfuss 所表示的政策正跟蒲安臣相反。他堅決反對「北德意志邦聯」跟中國簽訂與美國類似的合約，因為：「這種變種的民族，如中國」只能透過「決定



性的武力」來對付。³¹聽到的這語調，幾乎跟 1933 年後在德國通常的語句類似。然而俾斯麥，並不會受到外事部這種書信的影響。他是施行他認為對的政策。

蒲安臣跟俾斯麥在 1870 年 1 月 2 日第一次會談，並於 1 月 3 日 4 日兩人在外事部又見面會談。此後蒲安臣與俾斯麥繼續通信交換意見。蒲安臣特別指出，一些西方國家對待中國的方式，只看在利益上，他們卻又不願放棄這些好處。然而，這些目前的利益是短期的。他們要竭其所能的利用中國目前的弱勢，因此不是明智的，而是短視的政策。兩國間良好關係和長遠的利益，只能建築在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平等的主權上。

俾斯麥的想法大致是跟蒲安臣類似。他在 1870 年 1 月 16 日的一封給蒲安臣的信中說：「承認中國為國際家庭的成員，跟歐洲所有列強對所有權利和利益同等。」³²俾斯麥強調，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對政治，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重要，他談的是中國，但肯定也是在指德國。

(三)、自強運動的合作 1870-1895

1870 至 1895 年為繁榮時期，德國和中國之間深入的合作，在中國自強運動期間的改革和現代化努力，雙方有著密切的經貿關係。這段期間，不受政治上的牽累，德意志帝國在東亞沒有帝國主義的野心。在開始的時候，中國對德國的形象改變。從 1870 年起，德國為中國的自強運動改革方案的首選合作夥伴。這時中國有兩種持相反意見的黨派：一是反對改革，另外是改革派。改革派的目標為軍隊現代化，產

³¹ Bundesarchiv Potsdam: "Rehfuess mehrere Schreiben an Bismarck," 14.01, Bd. 1, 42, 83, 96, 105.

³² Schrecker, John: *The First Chinese Embassy to Germany*, p. 418.



業和基礎建設設施現代化，以便使中國強壯，恢復主權和捍衛獨立。

中國選擇德國為合作夥伴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德國的軍事技術優勢，普魯士（德國）在 1866 年與奧國的戰爭和 1870 年至 1871 年法國和德國的戰爭，德國的 dreysesche 槍針，普魯士的步槍和從後方加載的 Krupp 的火砲，優於法國青銅大砲，其次，德國在此時期內，不像其他合約列強，在中國沒有帝國主義的野心。第三 1870 年至 1871 年的法德戰爭後，德國的發展和德意志帝國的成立，德國的新形象為中國自強運動者的效法榜樣。

1. 1870 年至 1871 年後德國在中國形象的改變

在 1861 年 Eulenburg 代表普魯士與中國談判協議，當時普魯士在中國幾乎不為人知，而且四分五裂，似乎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國家。德國要求中國要等同大國如英國，俄國和法國，訂立條約，受到中方很大的阻力。這種態度很明顯的在德國戰勝法國後，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 1870 年至 1871 年蒲安臣在聖彼得堡跟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談判後生病，於 1870 年 2 月 23 日過世。中國的大使團儘管受到蒲安臣過世的損失，仍繼續其使命行程，在巴黎又逗留的期間，經歷德國的勝利。王韜³³為領導中國自強運動政治家李鴻章的顧問，也同樣到歐洲旅行，王韜在 1873 年出版一本書《普法戰紀》記錄德國和法國的戰爭。這裡也看到了年輕的普魯士德國和中國之間歷史相似之處。這時引起人們新的關注，在 1850 年徐繼畲（1795-1873），寫過一本書《瀛寰志略》（Kurzer Bericht ueber den Erdkreis）。

³³ 王韜，《普法戰紀》（香港：中華印務總局，1873）。



其中提到，1806 年 10 月 14 日普魯士被法國拿破崙一世擊敗(Battle of Jena-Auerstedt)，普魯士國王 Friedrich Wilhelm III 逃難離開，普魯士和德國分別由外國人所分治和受到屈辱，然而，國王授權給一群有才能的人作根本性改革如 Stein、Hardenberg、Scharnhort 和 Gneisenau，因此他的國家重新振興。在 1813 年擊敗法國和解放德國。1870 年至 1871 在戰勝法國拿破崙三世後，建立德意志帝國。

2. 1870 年-1895 年自強運動期間的合作與經濟關係

最遲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中國戰敗後，中國的精英意識到，中國軍備的現代化，以西方的標準來建立武裝和培訓的必要性以及為此創建工業設施為基礎的必須性。³⁴

中國的獨立和恢復主權的政治目標，只能靠國防武裝現代化的力量來達成。1862 年至 1894 年期間的必要改革方案和努力稱之為自強運動。³⁵此運動主要人物為曾國藩(1811-1872)、李鴻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張之洞(1837-1909)，直到 1884 年在恭親王的領導下。這些人物在剿太平天國之時，獲得舉足輕重的職位，在消滅太平天國後，使得他們取得合法的地位。

3. 自強運動的初步階段

在對抗太平天國 1860 年代初期，已有第一批現代化的裝備和訓練。在 1851 年來對抗太平天國之亂，中央政府的軍隊幾乎被消滅殆盡。士大夫如曾國藩、李鴻章授以特權建立新的軍隊，他們從受到威脅核心區域的省份，組織自衛

³⁴ 夏東元，《洋務運動史》(大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³⁵ 同上註。



軍。遠離中央的行省，建立在省長指揮下的地方省軍隊。因此這些省份屬轄下的軍隊，為第一批現代化的軍隊，其中以李鴻章的淮軍為最傑出。³⁶可是現代化武備沒有西方顧問和教官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因此不得不求助於剛剛對中國作戰的西方英、法軍事專家。1860年10月在北京訂的「公約」，這些列強都願意支持中國政府，因為他們認為互相攻擊的太平天國，不能夠在中國建立一個穩定的治理管轄政府。英國和法國先是保持中立。但是，當太平天國軍攻擊上海，它們要求中國政府為外貿和西方的利益，防禦這座重要城市。

李鴻章從兩江總督曾國藩，得到命令抵抗太平天國，保衛上海。³⁷李鴻章為江蘇巡撫，他利用巧妙的戰略政策，靠近在此富饒的物力城市戰鬥，得到在上海駐紮的英國軍官 Charles Gordon (後稱 Gordon of Khartoum, 1833-1885) 支持，能使他的軍隊擴充和實現現代化目標。從 1862 年 6 月他的淮軍為 5,500 人，有 100 支西式槍，在 9 月可以採購 1,000 支現代步槍使用。在 1863 年 5 月淮軍已經有 40,000 人擁有 15,000 支現代步槍，和幾個 12 磅炮 (12-Pfund-Geschuetzen) 大小的火炮。太平天國 1862 年進攻上海時，李鴻章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他得到上海地區的地方稅收的收入之後，繼續擴充軍備。

1865 年，戰勝太平天國後，他的部隊淮軍是中國第一座現代化的軍隊，有 50,000 人配備 40,000 現代步槍，四個砲兵營有 20 個現代化的大砲。初為保衛上海城市的現代化軍隊，這時開始反擊，1864 年 7 月擊敗佔領南京的太平天國軍隊。同樣的此軍擊敗捻亂，和其它的叛亂。到 1868 年，中

³⁶ 樊百川，《淮軍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³⁷ Samuel C. Chu and Kwang-Ching Liu, *Li Hung-Chang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New York: M.E. Sharpe, 1994), p. 22.



國內部得以和平，為重建和現代改革奠定良好的先決條件。³⁸跟外國軍官和專家們合作的必要性，如一把雙刃劍。他們對中國上級的一點不忠心。尤其加上英國人或法國人對中國具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衝突屢起，最高點為 Osborn-Affaere 事件。1861 年中國與英國合作，收購一些英國船隻，想要以此為核心，建設一支中國艦隊。在 1863 年 9 月這個艦隊，由七個小軍艦組成，由英國船長 Sherard Osborn 帶領抵達中國。

他與英國在上海的稅務官員 Horatio Lay 聯合，拒絕已經支付的軍艦移交給中國，並聲稱他為此中國船隊的司令，英國水兵為船舶的人員。這些中國不需要的外國人員，卻要求由中國上海海關稅支付高薪。這是中國政府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產生巨大的衝突，此結果為這些船返回到英國，而售出給他人。這件事情，給中國帶來莫大的虧損。因此，英人此舉為極令人憤慨的措施。然而與西方專家合作是必要的，但是重要的，不能依賴他們。再次使用一個古老的方法「野蠻人對付野蠻人，以夷制夷。」³⁹利用外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爭取對中國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合作。

(四)、軍備與德國的經濟合作 1870-1895

基於這個原因，在 1870 年後，德國是中國在自強運動期間首選的合作夥伴，加上德國在軍事技術的優勢。普魯士（德國）在 1866 年與奧國的戰爭和 1870 年至 1871 年法國和德國的戰爭，德國的 dreysesche 槍針，普魯士的步槍和從後方加載的 Krupp 的火砲，勝於法國青銅大砲，德國戰勝。

³⁸ 中國史學會編，《捻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 115。

³⁹ Chunxiao Jing, *Mit Barbaren gegen Barbaren: Die chinesische Selbststärkungsbewegung und das deutsche Rüstungsgeschäft im späten 19. Jahrhundert* (Münster: LIT Verlag, 2002), p. 45.



為了不依賴外國，最初中國先模仿製造現代化武器生產。1861 年曾國藩在安慶構建武庫，1864 年江南製造局建立在上海，1863 年在上海成立金陵製造局，1865 年李鴻章將其轉移到南京。然而這些兵工廠生產的武器，品質不令人滿意，部分不經濟。由於一些所需原材料必須從國外購買，在國內生產的成品件，成本相應的比購買國外產品價格高。這些購買價格在外國供應商彼此競爭之間顯著降低。⁴⁰

因此德國逐漸成為中國的武器項目中與英國競爭的主要供應商。在槍砲領域中，德國 Krupp 公司達成幾乎壟斷供應。從其他製造商如槍和大砲中國分別購買小的數量，如英國 Armstrong-Werke 或是法國 De-Bange-Geschuetz 槍和大砲，這是要讓 Krupp 也有競爭的對象。Krupp 在 1871 年和 1895 年之間，出口到中國 1942 火炮，它佔這一時期出口總額（14039 件）13.8%和佔 Krupp 公司共生產 24148 火炮的 8%。⁴¹Krupp 在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為英國 Armstrong-Werke 公司。Armstrong-Werke 在同一時期只佔 Krupp 公司 15% 的交貨數量。槍砲除了地面部隊設備外，主要是使用在海防設備，以及中國海岸堡壘和建造海軍基地工事。

在這方面，要介紹德國工程師和前軍官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他為防禦工事和軍事專家，他設計旅順港口和監導旅順海軍基地工程的進行，以及後來的海軍基地威海衛。由於他非凡的成就和個人的可靠性，中國皇帝接受李鴻章建議，授予高級官員地位花翎總兵銜。漢納根也為中國軍事顧問和中國軍隊的教官。他具有這方面的能力，在甲午戰爭開始時，他陪同英國四艘船舶運輸中國的兵隊赴朝鮮。日軍將其包括救生艇擊沉。這支艦隊在 1894 年 7

⁴⁰ 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

⁴¹ 同註 39，頁 143。



月 25 日宣戰之前，為日本軍艦敵對行動的正式開始的轟擊進攻行為。1,000 名中國士兵和 200 名船員死亡。漢納根與一群中國士兵漂浮在海上七小時，被德國的砲艦（ILTIS）連同 30 名中國士兵救起得生。⁴²

除了上述所述的 Krupp 火炮，Krupp 還建造軍艦上用的火炮。中國沿海是不能只靠沿海不能移動的大炮來防衛。中國海軍的建設是必不可少的國防防衛。這筆費用在於財政困難的形勢下，為極大的負擔。1874 年台灣島上的日本攻擊，雖然被擊退，但經過這次事件看出建設中國海軍海權是勢不可缺。1879 年中國駐柏林大使李鳳苞⁴³跟英國交涉收購兩艘裝甲巡洋艦，它原本為土耳其所建，它們的購買，中國預期能以競爭力的價格購成。英國為了顧及政治上的因素（Yili-Krise 危機）並沒有實現此舉。因此李鴻章委託李鳳苞大使，提供歐洲造船業的一般概述。成立於 1878 年 11 月的德國 Vulkan-Werft bei Bredow in Stettin Panzerkorvette 邀請李鳳苞到其船台上參觀商談。這個關係和價格優惠的基礎上，Vulkan-Werft 在 1880 年和 1881 年建造兩個相同的鐵甲艦。這些戰艦的排水量 7,335 噸的和裝載 329 船員，為兩個最大的中國船舶和戰鬥效能高的海軍軍艦。⁴⁴工程施工建設是由德國海軍監理和支持。金融是由柏林銀行 Bleichroeder 保證。⁴⁵這兩艘鐵甲艦的名稱為定遠和鎮遠。Vulkan-Werft 繼續為中國海軍軍艦北洋艦隊建造三隻軍艦。在 1885 年防護巡洋艦

⁴² 張暢、劉悅，《李鴻章的洋顧問》（新北市：德瑾霖與漢納根傳記文學出版社，2012）。

⁴³ 李鳳苞（1834 年—1887 年 8 月 7 日），愛好曆算，精於測繪，深為李鴻章賞識。曾捐資為道員，後受命辦理江南製造局、吳淞炮臺工程局，為清末外交家，曾任駐德國公使。請參閱李鳳苞，《使德日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⁴⁴ 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⁴⁵ Helmuth Stoeck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Das Eindringen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 (Berlin: Rutten & Loening, 1958), p. 125.



(穹面鋼甲快船)，濟遠（水上排水量 2,300 噸）和在 1887 年兩個裝甲巡洋艦（Panzerkreu）經遠、來遠（每艘 2,900 噸）（如下表所示）。

表一 主力艦隊

艦名	艦種	排水 (噸)	馬力 (匹)	航速 (節)	火炮 (門)	魚雷 (具)	乘員 (人)	管帶	製造 地	下水 (年)
定遠	鐵甲 艦	7335	6200	14.5	22	3	331	劉步 蟾	德國	1882
鎮遠	鐵甲 艦	7335	6200	15.4	22	3	331	林泰 曾	德國	1882
來遠	巡洋 艦	2900	4400	14	16	2	202	邱寶 仁	德國	1887
經遠	巡洋 艦	2900	4400	16	14	4	202	林永 升	德國	1887
致遠	巡洋 艦	2300	7500	18	23	4	202	鄧世 昌	英國	1886
濟遠	巡洋 艦	2300	2800	16.5	11	4	204	方伯 謙	德國	1883

資料來源：胡立人、王振華，《中國近代海軍史》（北京：大連出版社，1990）。

福建和浙江總督左宗棠委託 Vulkan-Werft 船廠建造船舶。1883 年建成戰艦，編制為南洋軍艦。在 1891 年，北洋艦隊在渤海灣進行重大演習。船隻的功能和情況狀態優良，得到國際認可承認。六位德國軍官和德國海軍官員和 Krupp, Vulkan-Werft 公司的創建者 Krupp, Albert Schludow 由中國政府授予雙龍勳章。⁴⁶

⁴⁶ Thronbericht von Li Hongzhang 23. Mai 1888.



私人企業經貿關係 1870 年至 1895 年中國和德國的貿易關係，又經歷一段繁榮時期，但仍在與同行業競爭中。在跟英國、美國和日本的貿易競爭之下，德國至少占第二或第三位。1855 年在中國只有 7 個德國貿易公司，於 1877 年有 41 個德國貿易公司，到 1897 共有 104 家德國公司的總部或分支機構在中國經營。⁴⁷

1871 年，西門子公司在香港設立電報電纜，電報線和建立來往香港和上海的電信。在 1889 年，成立德亞銀行，總部設在上海，其股東，由不同的德國的銀行組成一個財團，如 das Bankhaus S、Bleichroeder、die Deutsche Bank、die Bayerische Hypotheken 和 Wechselbank und M A Rothschild & Soehne，抵押貸款和外匯銀行。最初，此銀行的任務為資助德國進口和出口，後加入德國公司參與的鐵路建設項目融資。從 1895 年起，銀行也起到簽訂中國政府債券的重要作用。而從 1906 年擁有特許權，能發行自己的鈔票。⁴⁸此德亞銀行在天津、漢口、北京、廣州以及德國柏林等地都設立分公司。

在 1885 年，德國郵輪按時往來 Bremerhaven、Hongkong、Shanghai 和銜接線從香港經橫濱到韓國郵輪線，和長崎到香港間等的來往服務。自蘇伊士於 1869 年開通後，東亞地區和歐洲之間的水路通道越來越多由帆船轉換為蒸汽船。

(五)、1895 年至 1917 年期間

1895 年至 1917 年間重要的細節，不在這項研究中交代，

⁴⁷ Bericht Ostasiatischer Verein, 1900, in: Fabrizek, Uwe G.: Gelber Drache Schwarzer Adler, 1973, p. 46.

⁴⁸ Maximilian Müller-Jabusch, *50 Jahre Deutsch-Asiatische Bank: 1890-1939* (Berlin: Geschrieben im Auftrage der Deutsch-Asiatischen Bank, 1940).



但是在本節中，簡要總結這段歷史顯著性的發展。1894年至1895年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因為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震撼全國，同時引起帝國主義列強，新的緊迫和近一步的攻擊中國。自強運動的主導李鴻章因此失去權力、職位和影響力。光緒皇帝百日的戊戌變法，圍繞皇帝的年輕顧問，本身沒有足夠的權力力量，變法得不到什麼支持，國內的政治對立派，反對改革，不肯跟外國妥協。因此，在1898年9月的宮廷政變，導致削減在北京的皇帝權力。這一派尋求義和拳為聯盟，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失權墜毀。隨後在清末改革派精英得勢，在中國再次進行廣泛改革，但無法阻止1911年至1912年間革命的發展。

德國大使 Max von Brandt 一再告誡，在武備自強運動還未結束前要避免戰爭。可是日本在1894年對韓國的野心進攻，戰爭很難避免。其結果在1895年的馬關條約 Shimonoseki，台灣和遼東半島要割讓給日本。但經過德國、法國和俄國三國干涉的結果，日本只得放棄遼東半島。

1896年李鴻章去德國拜訪俾斯麥，這兩位偉大的政治家站在事業結束的末端，在他們之後開始一個新時代，中德關係也發生變化，俾斯麥在這場相會中，說出一句中國式的話：「所有都在變化，所有都會顛覆。」

在德國，俾斯麥於1890年被解僱，為一個轉折點，特別在外交政策方面。俾斯麥尋求政治聯盟，放棄在歐洲擴張的和平政策，以便確保他在中歐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在俾斯麥解職後，威廉二世皇帝不再繼續該聯盟政策。取而代之的為即興外交「自由之手」(Freien Hand)的政策，不具有約束力的合約和讓所有的可能性自行發展。加上擴充帝國主義的



對外「世界政治」⁴⁹政策，導致德國的外交政策孤立。到處貿易政策和權力威望結合。而這世界政治，往德國殖民地和德國海軍據點發展。和海權艦隊軍備的擴張，使得英國成了敵國。德國為「後來者」(Spaetkommer)，實行帝國主義政策，效法其它歐洲列強的「成功」，但這一政策使得德國的政治外交隔離，最終導致第一世界大戰。

1. 膠州-青島

中國是在德國新的世界帝國主義政策下，為第一個受到被奪取土地的國家。傳教士事件，以兩名德國傳教士於 1897 年被殺害為藉口，佔據中國土地。這是 1896 年以來對奪取中國土地的野心。1897 年 11 月 14 日，由海軍陸戰隊佔領山東半島膠州灣。於 1898 年 3 月 6 日中國政府被迫訂立「租賃」99 年為期的協議。中國喪失該地區的主權。然而在暴力和違反民族法的奪取土地後，在 1898 年至 1914 年間，德國卻竭力建設青島。德國的殖民地，成為一個現代化模範的城市。人口大幅上升，在 1902 年青島有中國居民 14,905 人，688 歐洲人。在 1913 年 53,312 中國人和 2,069 歐洲人。主要是中國的移民。德國為中國人設立青島專校，以德人為師資。德國建設青島，不在於獲利。如 1906 年德國投資一千四百萬馬克，收入只有一百萬，貼補一千三百萬。投資的工程造價，遠超過可以實現的收入。膠州灣殖民地，首都青島，是德國表現其威信的象徵。即使孫中山本人於 1912 年 9 月訪問青島時，稱讚德國在此期間的建設，他同時請求，將此殖民地歸還中國。⁵⁰

⁴⁹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II* (Muenchen: Beck, 1998), pp. 621-683.

⁵⁰ Interview des Journalisten Erich Salzmann mit Sun Yatsen in Shanghai am 4. Oktober 1912 in: Leutner, Mechthild (Hrsg.), *Deutsch-chinesische*



2. 義和團拳亂

1900 年德國駐華大使 Clemens von Ketteler 在北京遇害。八國聯軍因此以德國 Alfred von Waldersee 元帥作為統領，在其命令下討伐中國，波及村莊，數以百計老百姓死亡，這是德國帝國在中國造成悲劇的高潮。

義和團 1898 年起源於山東，為德國的影響區，在當時直隸（今河北）的東南方。義和團的民眾活動是受到列強帝國主義的壓迫所致，特別是傳教方面的衝突。1895 年後，衝突增加。傳教士受到不平等條約的治外法權的影響，深入內地，享受特權。

北京得到消息，外國在天津的駐軍非法向北京進發，這使得情況尖銳化。在這之前，北京政府保護外國人，制止義和拳。最後的轉折點是外國駐軍侵占大沽口。這樣的進攻，並非在保護外國人，而是危及他們。這是準備進攻北平。外國駐軍進攻中國沿海的堡壘，這是進入戰爭狀況。慈禧太后於 1900 年 6 月 21 日宣戰。北京的大權進入偏極派手中。大部分中國的省，沒有加入 1900 年的戰爭，它只侷限於北京地區。

德國大使 Ketteler 於 1900 年 6 月 20 日登上外交人員的轎子去總理衙門。他在前一天曾要求到那會談，沒有得到回覆。他在路上不是被義和拳人所殺，而是被中國軍人所殺害，在警察站崗處前。在北京也沒有人來接見他，那裡有相當職位的對口人員在場。對這謀殺有不同的解說，也有不同的證人口供。這裡要說明的是，北京皇室由對外國人仇恨和反對改革的偏激份子掌權，他們跟義和團合作。也有不少高級官員，反對用武力對付外國人，為中國基督徒說話，卻被

Beziehungen 1911-1927, Quellensammlung, Berlin 2006.



處極刑，如多年為中國駐德大使，購買德國軍艦的許景澄在 1900 年 6 月 28 日被處極刑。

外國使館區並沒有被義和團佔據，而是由正規軍包圍，不時射槍，但沒有衝進去佔領。包圍外國使館，目的是要威脅，以便能有利於跟外國列強協商交涉。此外這些保衛軍隊也在保護外國使節，不受到義和團的危害。

外國軍隊於 1900 年 8 月 14 日攻陷中國的首都北京。對佔領區人民欺凌，進佔皇宮，外國婦女坐上皇帝寶座照相，造成中國進一步的動盪不安，引起政治更加偏激。

3. 百年世紀的轉換到一次世界大戰

1900 年後，為再次德國對東亞洲和中國政治的一個轉折。德國在歐洲外交政策受到越來越多的政治隔離，使得德國在東亞靠攏支持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防止列強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德國結束山東半島上的擴充政策，增加與中國晚清 1905 年起改革期間的文化合作。

在上海的德國同濟大學，成立於 1907 年，其源於“Deutsche Medizinschule für Chinesen in Shanghai”德國為中國上海建立的醫學院。同濟大學目前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大學之一，至今仍然為德國和中國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

德國對 1911 年至 1912 年的中國革命，採取中立的立場。在外交上與其他列強於 1913 年 10 月 6 日一起承認中華民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於 1914 年 8 月 3 日在歐洲爆發。日本在 8 月 15 日，對德國提出限期八天的最後通牒，要求德國在膠州灣的殖民地交給日本。德國向中國政府總統袁世凱提議，要把此殖民地歸還給中國。中國在英國和日本的壓力



下，不得不拒絕德國這項完璧歸趙的建議。日本在 1914 年 8 月 23 日對德宣戰，未經中國軍隊同意，進軍登陸山東半島，攻擊膠州。德國軍隊，被切斷跟德國的聯繫，只好於 1914 年 11 月 7 日投降，日本佔領青島。5,000 名德國和奧地利人成為日本的俘虜。

歐洲戰場爆發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外交努力阻止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國宣戰。此時德國駐北京大使的前海軍上將 Paul von Hitze，他從 1918 年 6 月中至 10 月上旬，為德意志帝國的最後外交國務卿。他與孫中山接觸，孫中山反對與德國宣戰。北京政府在巨大壓力下，對德宣戰。宣戰的後果是，所有德國和德國人在中國的財產被沒收。孫中山先生說：「中國沒有理由，對德國宣戰，也沒有理由參與還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的對德宣戰行列。」相反的，孫中山尋求長期與德國結盟，建設中國和實現中國現代化。因此，他說：「德國的財產，也許可以沒收，但德國的能幹，是沒收不了的。」

51

但在 1917 年 8 月 14 日北京中國段祺瑞政府，在英美和日本的壓力下，對德宣戰。宣戰理由為德國在歐洲的無限制潛艇戰，但對中國航海，並沒有影響。

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沒有跟德國交戰。中國沒有派出部隊到歐洲，但派遣 15 萬多名工人，其中派在法國前線附近挖戰壕。約有 10,000 多人喪生。中國對德宣戰，是在壓力之下。德國和中國之間，不存在戰爭的原因。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民眾希望，戰爭後中國能與列強英，美和其它國家，受到平等待遇，即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並能收回 1914 年日本佔領的德國殖民地，位在中

⁵¹ Sun Yatsen, Existenzfrage, 1917.



國山東半島的膠州/青島。但是這兩項願望在戰爭結束後，都未曾實現。由此在 1919 年，導致中國的五四運動。

